

蜕变

崔济哲

—

那夜月朗星稀，真如水银泻地。

和 365 天里的每一天一样，队长登上梯子爬上房，先响亮地咳嗽了两声，像京剧舞台上全套扎靠的铜锤花脸咳嗽叫板一样。我们生产队的队长叫祁黑小，祁队长把手罩成喇叭状转着身子喊开了：“注意喽，注意喽，队上的男女社员快快地到队部开会了，有重要的事情说啦！”一遍又一遍，祁队长的声音淳厚、宽润、高亮，一点不亚于京剧花脸大家杨小楼、袁世海，尾音飘飘悠悠地能传出去好几里地。农民也真可怜，白天学大寨，晚上还要政治学习。那时候要么叫社员，人民公社社员，向阳花；要么叫贫下中农，毛主席说要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不叫农民。当年我们学校有位从印尼刚刚回国的华侨老师，闹不明白贫下中农是什么，以为是一位德高望重的国学大师：“这位大师怎么起了四个字的名字？”引得哄堂大笑，闹得她羞愧难言。

说当人民公社社员不容易。贫下中农说：农业学大寨，苦就苦吧，祖祖辈辈谁都逃不出脸朝

黄土背朝天，受苦人还有不受苦不干活的？受不了的是干了一天活，受了一天累，出了一天苦，晚上还要开会学习，哪朝哪代见过农民天天点灯熬油地学习？还逼着发言，又不是真发给 2 斤咸盐。贫下中农总结的：7 点开会 8 点到，9 点去了先睡觉，10 点快到听报告。祁队长一般是三遍喊，像阳关三叠似的，然后是三遍锣。不是真正的锣是挂在队部院里的一个生铁铲，敲得一遍比一遍急，像名角出场前的出台小锣。

农村开会很有意思，先去的一般是男人，老男人居多，进队部早的往热炕头一躺，晚的往炕尾一挤，再来晚的只能蹲着站着，虽然姿势各异，但有一个动作是保持一致的，那就是抽烟。抽的都是自家种的小叶子烟，又辣又呛，老汉抽大烟袋，年轻人点的卷烟炮，抽得屋里烟气腾腾，没点火神爷的功夫会立马被熏得鼻涕眼泪一块流。

当然也有一说开会立马三刻就到的，几乎没有一个人迟到。贫下中农说“7 点开会 7 点到，8 点到了一泡尿”，意思是 8 点再去黄花菜都凉了，全误了。公社来的干部总结说这是批林批孔新气象，一说政治学习，贫下中农的积极性、主动性高

得很，快赶上解放军啦。贫下中农说，纯粹是狗戴帽子，胡勒。那时候公社供销社分配下来的布料，其实就是华达呢和灯芯绒，一般分配到生产队就是两三块，凭发的“号”去买。那年月党风实在好，干部实在廉洁，这两块布料家家都想要，谁家没有个婚丧嫁娶？那个时候说个媳妇，财礼单里肯定要有这两种布料，怎么分？贫下中农又拿出老祖宗传下来的办法——抓阄，谁抓着算谁的。每次队长都把我叫去，因为我绝不要那劳什子。贫下中农信任我，无需就无私，古今一个理。写“鸡蛋”，就是在两张纸上写上“有”，其余的都是空白，然后揉成一模一样的纸团，乡亲们俗称“抓鸡蛋”，把纸鸡蛋放到一个筐箩里，由我送到每一个人面前，来晚了活该作废。最可笑的是一共两个纸团写着“有”，已经被抓走了，可剩下的人都不走非要一个一个抓，抓完打开看看，正反两面都看看，确认自己手上的纸条没有“有”，才扔了纸条快快地走了。你告他们没有“有”了，别抓了，但他们都不相信，瞪着眼睛要坚持抓，那神圣劲好像真还能抓出个“有”来。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贫下中农最认真。

那天晚上，我凭经验觉得开会还早着呢，再看20页书去也不晚，又不是“抓鸡蛋”。再说，我已接到公社的通知，去县里色织厂上班，即将告别农村这所大学校，不再挣工分，土里刨食了。开会迟就迟点吧，无所谓了。

可没想到副队长却专门跑来“请”我去队部开会。我受宠若惊，心想不是又派下活来让我去写批林批孔的发言稿吧？我们生产队的副队长是位年轻后生，干活生猛，嘴讷口笨，话少得跟黎明时的星星一样，只是说事大哩，人都到了，就等你了。

一进队部，就把我吓了一跳，没想到这么早，来开会的人已那么多。那时候生产队没有钟表，看时间全凭“三分估计，四分掐算，剩下三分抬头看天”。我们生产队队部大，一排6间贯通的大房子，满屋的人。满屋子的烟和那些朝夕相处的乡亲们，一个个神情特庄严，从他们看我的眼神中能感觉出来，今天的会与我有关。只见闪出一条窄窄的小道，我侧着身子挤到中间，原来真是为我开会，开欢送会。祁队长站在一个板凳上说，明天老崔就不用受苦受罪当社员了，人家就到县里

当工人挣工资了，也就不再是咱生产队的人啦。祁队长又剧烈地咳嗽起来，咳嗽完好像忘了再该说什么，抽了好几口烟才说，六七年了，在一起干活，乡亲们都有些舍不得，我感到有点像往外嫁闺女，又是个欢喜又是个愁……

轰地一声，乡亲们都笑了。

那年月的生产队长都挺能说的，别看祁黑小没念过几年书，但讲话的水平不低，除了批林批孔，理论学习，批儒反法，他吭吭哧哧说不上来，说起其它事来，都自如得像满口吃崩豆。祁队长说这些年，人家由一个北京娃娃变成了咱村的受苦人，吃不上喝不上，受苦还得睡冷炕。乡亲们笑着调侃，那你还不把你老婆的热炕头腾出来？祁队长咧开大嘴哈哈笑着，像伸出水面的非洲河马毫无顾忌地张开大嘴喷着水花。祁队长说话的确有水平，夸我给他们生产队引来文化水，像浇旱地灌菜园子，帮他们应付了多少难事。不是批这就是批那，光批还不行，还要上报批判材料，队部里还要办批判专栏，队长说，我现在就发愁了，他走了以后咱可咋办哩？不过咱队上也了不起，把受咱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知识青年，教育成领导咱的工人阶级了！这年月咋就这样一轮一转的？今晚上还是咱教育他呢，明天天一亮，就轮上人家领导咱了，这世道转得真像推着跑的水车啊！

祁队长接着说，咱生产队穷，这些年没少向你借钱，一块两块，最穷时借过5块钱。因此，明天晌午，变成工人阶级领导贫下中农的第一顿饭由我请吧。我的房东大爷一听不干了，说在俺家住了好几年，你们就别争了，明天晌午俺们家定下了。

我还真不知道曾经为村里的乡亲们做过那么多好事，给人家张老汉买过缝纫机。买不回缝纫机张老汉家的媳妇就退婚，财礼单上第一“大件”就是必须抬去一台缝纫机。张老汉和张大娘急得差点给我跪下了。张家三个儿子，前两个是光棍，都没娶下媳妇。老儿子说下的媳妇又“命悬一线”，拿不出财礼就退婚，张老汉是纯粹的贫下中农，张大娘50多岁愣没进过县城，最近就逛过一回公社供销社，回来兴奋得几天几夜睡不好，见到谁对谁说供销社里的花布，供销社里的海盐，我们村那时都吃土制的盐碱；还有供销社里的洋瓷盆。《红楼梦》中刘姥姥进大观园，那憨态

那作派，我信，我见过张大娘进供销社。那岁月在北京买台缝纫机也难，真难。一想到这事不仅关系一家人的幸福指数，甚至关系一家人的生存指数时，啥话也不说了，仰天长啸一声。寒冬腊月，骑着自行车，冻得脸都快青了，满北京城找亲戚找同学，发动我们全家找关系，干什么？找“工业券”，那时候没有 15 张那劳什子，缝纫机看都别想看。好不容易买上了，又和我的发小朋友借上三轮平板车一个人蹬着，一个人推着，从朝阳区的关东店一直蹬到丰台区的永定门火车站，刮着西北风。那时候，也就 40 年前吧，北京的冬天真冷，路边的杨树枝都能冻得叭叭作响，有的都冻断了，小拇指粗的树枝落下一地。那年头的人为什么都爱戴口罩？西北风戗的。房檐上的冰柱，能挂下来一尺多长。好不容易骑到永定门火车站了人家下班了，下午 2 点半才上班开磅。没辙，真是一点儿辙都没有。永定门那么大的火车站只有两家饭馆，吃饭发牌排队，挤都挤不进去，而且要饭的比吃饭的还多，还横。我们哥俩一摸又没带粮票，干咽唾沫干瞪眼。好不容易找见一个卖豆浆的，两个人喝了 8 大碗。永定门火车站真够逗的，站外愣没有公共厕所，憋急了，只好拿三轮车挡着就在永定门火车站广场边上尿起来，还真没人管。光天化日之下在永定门火车站广场上，拉开裤子就撒尿的大老爷们，除去我俩，焉有他人？所有亲戚、朋友、同学都一致警告我，千万别以为你是谁，千万别答应人家这种事，别说跪下哭，就是跪下拜，叫亲爹亲爷都不行！叫我着实得到一条教训，为人民服务也得有尺度。但贫下中农那朴素的阶级感情也真感人，从此我每年腊月回北京，张老汉借好队里的小板车，张大娘把他家两床被子铺在车厢里，非让我坐在车里，再给我身上搭上一床被子。拉辕的是老大，拉边套的是老二老三，非要把我送到县火车站。我又不是看病，更不是孕妇，弄得实在不好意思。我也粗胳膊硬腿的，走这十几里路算什么？车上又放鸡蛋又放红枣，又装核桃又装小米，我说我都准备好了。张大娘说，你是你的，这是咱们的一点点心意。我说什么也不躺在车上——太玄了，3 个贫下中农拉着一个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被教育者？传出去也好说不好听啊！张大娘快掉泪了，和张大爷双双把我撵进“卧铺车厢”，又帮我盖好被

好，又再三叮嘱 3 个儿子要走稳，感动得我真有些心颤颤的，走出很远很远了，还能看见老俩口直挺挺地站在凛冽的寒风中目送我。

张大爷张大娘双双站起来，义正辞严地说谁要敢和他们抢请吃饭，就别说搁下这些年这张老脸，我看张大娘泪眼里真有凶光。

队部里传出啜啜的哭泣声，随之是痛苦的抽泣声。花白零乱的稀疏头发刚刚盖住头顶，焦黄多皱的脸被心痛扭曲着，一手牵一儿一手牵一女，是她的孙子孙女，她站在我面前，我知道谁家我都不能去了，明晌的午饭肯定要去她家了，不能再给她的伤口上揉盐划刀了，她失去了儿子，孩子们失去了父亲……他叫杨喜康，曾经当过村里完小的民办教师，也算个知识青年吧。农业学大寨，我们村修了一个大井，为抗旱浇地用。说是大井名副其实，井口直径有 20 多米，打下去十几米后又在井底再打 4 口小井，不知哪口小井打在水脉上了，4 眼小井一起喷水，把大井也灌满半井筒深了。村里又在井边安上水泵，天旱抽水浇地。

那一井筒碧蓝碧蓝的井水，看着就喜死个人。我们插队的北京知青天一热，大中午都跑到大井去玩跳水、游泳，真找到在北京三里屯工人体育场游泳池和农展馆大窑洞的感觉了。

有一天中午，我正脱得赤条条躺在炕上睡午觉，几个乡亲一头大汗风风火火闯进来，不容分说拉起我就跑，一边跑一边说：喜康会两下“狗刨”，跳到大井里游泳，沉到里面没影了。我也慌了神儿，救人如救火，撒丫子就跑，跑到村外面坡地，看见大井已经围着满满一圈人，几个年轻后生脱得一些不挂站在井边上就是不敢下。我跑到大井边上一看，一井的碧水，瓦蓝瓦蓝的，缎子似的，连点褶都没有，只有几只长腿的水蜘蛛得意而傲慢地在水面上走着狐步。大井边上的人乱了，乱成了一锅粥。说什么都没用，火上房了还顾得上谁放的火？我憋一口气，从大井口上扎下去。水真凉，凉得透心儿。跑了一身的热汗猛地钻进凉凉的井水里，那滋味真不好受，睁开眼看，一开始什么也没看见，四处游了游终于看见喜康仰面躺在一个小井口的井沿上，一条腿压在身下，像睡着了似的。气也憋不住了，赶忙一蹬水浮上水面，大口大口喘着气。仰面一看，井口上全是拥挤

在一起的脑袋，都瞪着眼，张着嘴看着我。我这次有底了，又从容地钻到水里把喜康的位置准确地记下了，浮上水面后，让井边的后生们把早就准备好的绳子一根细一点的系在我腰上，以防不测；另一根粗一点的准备系在喜康身上。我反复交待，我一使劲，你们就往上拉，祁队长已经赶到了，他亲自带3个虎背熊腰的大后生抓住绳子头，说放心吧，只要你一使劲拽，我们4个人一起使劲，10个喜康也能拉上来。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再次一个猛子扎下去，游到喜康面前，一拉他的手，没想到他软绵绵的，一点分量都没有，轻得像床棉絮。我一拉他，他的头就歪过来了，身子就漂起来，我已经顾不上用绳子拴他的腰，一口气快用完了，就使劲拉手中的绳子，真没想到，祁队长的部队力量那么大，把我拉得像脱了弦的箭，不但头蹿出水面，连身子也被吊出井水。喜康终于被拖上大井了，我这才发现，祁队长他们使得劲太大了，系在我腰里的绳子把我的腰又勒又磨的硬是擦去了一层皮，有的地方都露出红肉来了，疼得我龇牙咧嘴，没办法只好把裤带系在胸上。

就这么一件事可让贫下中农受了再教育，传得神乎其神：在水里睁着大眼啊，和水鬼斗啊，在水里会喘气，有避水法啊……当年我们县里有个抗日的英雄闫四豹，曾经只身深入鬼子碉堡，杀了好几个鬼子，还夹着一个日本娘们儿得胜回朝，现在就把我传得比闫四豹还闫四豹。我走到哪儿，都有人围上来让我讲钻到大井里救喜康的事。你不行，拉着你不让走。这使我想起先生写的祥林嫂，祥林嫂一遍一遍说得没人听，说得人们都烦。我也一遍一遍，一遍又一遍地说，人家不但不烦，反而听得如醉如痴，不停地刨根问底地问。终于有几位大娘大婶大爷大伯出于好奇，非要我脱裤子看看我腰上的伤，我觉得没必要，生产队的赤脚医生什么药都没有，只有紫药水，我沾着棉花涂了一圈。乡亲们认为不好意思，就严肃地说，俺们都是有孙孙的人了，还不知道你腰下长着个啥？脱裤！老话说，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你遇见贫下中农能说清？没办法，只好解开腰带褪下裤子让他们看，没想到周围一片哎哟，看得个个眼瞪得铜铃一般，第二天全村都传遍了，我下井救喜康让缠住喜康的水鬼抓伤了，

一道一道的伤痕紫得怕人啊，幸亏我身上阳气壮，水鬼是阴鬼怕阳气壮的人，越传越神，以至于准备回北京躲一阵再来，要不走到哪儿冷不丁地让大娘大婶拉住就让脱裤子看伤口，谁受得了？一天晚上，房东大爷大娘极庄严地到我屋来又问在水里睁眼看见水鬼的事，大娘极认真又极惧怕地问，是不是有个蓝色的水鬼扒在喜康身上？我一去水鬼就扑上来和我打斗？又极坚定地不可理喻地让我脱下裤子，极其认真负责地弯着腰查看涂过紫药水的伤口。大娘那张嘴也真见功夫，第二天就说得一群男女把我堵在屋里，非要看水鬼抓伤的紫痕……

我到县色织厂上班一个多月了，村里的送别饭还没吃完，每到休息日，村里人都等在厂门口，叫我到他们家去，盘腿坐在热炕头上，喝着滚烫的烧酒，叙旧……

二

县色织厂是上个世纪60年代初为支援“三线建设”从天津整体搬迁过来的国营大企业。一水儿的现代化设备，一水儿的天津师傅，也只在近两年，安排过一些当地的转业军人。厂里的“母语”是天津话，天津话阳平音多，发音不说“天津”说“添井”，一下子就想起高英培说的《钓鱼》的相声：“二他妈妈，把咱家的大木盆你是端过来哟。”

色织厂是正牌国营大企业，这次一共招收30多名新工人，也是一水儿的北京插队知识青年，没有一个当地人。后来才知道，是因为与一件“奸污北京女知识青年案”有关。进厂第一课是入厂政治教育，那岁月还不兴叫培训。那时的政治工作厉害，一针扎在脉上，一抓就抓得让人打激灵。第一次坐进会议室就叫我们这些多年在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被教育者着实提气。斗大的十个大字“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光灿灿地镶在迎面的横幅上，下面还有一行小字：“今天是你走进工人阶级队伍的第一天”。当时，直觉得有点晕，感到一股热血直涌胸口，颇有鲤鱼跃龙门的感觉。一种前所未有的自豪感油然而生，别的全忘了。当时的那种一下子站到领导阶级队伍中的自豪感似乎今天还在。

工人阶级的优越性立马彰显，我们是月底上

的班，离天津师傅说的“开支”只有5天，但厂里按规定给我们一个人按出勤一个月开支。每人拿着刚刻好的图章——天津师傅叫“手戳”——领工资，一生第一次拿上国家给开的工资，天津师傅叫“关饷”。少是少点，才16.5元，但厂里劳资科讲得明白，我们这批知青是按上级指示“特招”的，本来工厂不要这么大年龄的学徒工，但上级硬压着要招——在农村插队的插龄没有中央文件因此不能算工龄，只能按学徒工走。而色织行业是按棉麻工资序列计算工资的。我们这些刚进厂的学徒工，是棉麻序列的22档。劳资科长，一口纯正的天津话，抑扬顿挫，入耳好听。我们没人不满意，不是阿Q精神——在农村生产队一年也就挣几十块钱还是白条兑不了现，现在一个月就捧回一堆碎银子，另外还有盼头，明年一个月就挣22块5毛钱，偷着乐吧！高喊万岁，万岁万岁，都是发自内心的。

所谓“奸污北京女知青案”，我们知青叫它“马二河事件”。

马二河是个人物，是我们生产大队的民兵营副营长，转业军人，当年在部队也是大名鼎鼎的二等功臣，三等功记过数次，是从班长、代理副排长的位置上复员的。在一次打隧道施工中负伤的事迹曾经上过铁道兵的报纸，有句口号当时在他的部队叫得挺响：“全师学习马二河！”不知为什么，伤养好以后复员回了村，跟他兄弟马大河、马三河、马四河一样，也来农业学大寨，不同的是马二河是个“官”，不用每天钉在黄土高坡上。我见过马二河，标准的晋西北汉子，脸有棱有角的，粗眉大眼，厚唇高颊，宽肩粗腰，走路刮风似的，一身新潮的国防绿，军帽戴得端端正正。不知何时何地与他们队上的一位女知青搞上了，那位女知青我们都认识，有时候开会能碰上，还能模模糊糊记起长的什么样。这事在知青圈里早就传开了，逐渐成了公开的秘密。后来不知为什么闹翻了，据知青们传说是因为马二河家逼婚所致。马二河家没少在那位女知青身上下功夫，该花的钱花了，差不多“三天一小宴，五天一大宴”的，家里还有两人住的喜房，里面三新的全套铺盖。马二河的复员费花得也差不多了，马二河的爹娘着急，恨不得立马明媒正娶抬到家里来。老两口害怕热闹一阵凉了，北京女学生走了婚事也就完

了。他家4条河，4条光棍，好不容易“逮住”一个女人，焉能不着急？马老爷子和马太太不知道同居和结婚不是一码事，那位女知青不是甘心把自己一辈子拴在晋西北农村大土炕上的人。最后催急了，催炸了，那位女知青“急了抓蝎子”，告到了县上。马二河因此惨了，县里在大队部召开全体干部和知青大会，马二河被五花大绑地推到戏台上批斗，宣判。马二河不愧是立过二等功的军人，军装风纪扣系得紧紧的，嘴里咬着他那顶从部队戴回来的国防绿军帽，马二河不屈地想昂起头，想看看乡亲们，他可能觉得冤似大海，两眼血红血红地瞪着地。公安局特地派了两个干警押他，连他的双腿也死死捆住了。因为他总是使劲跺脚，

公捕公审大会上人很多，会场上死气沉沉，连咳嗽声都没有。

后来那位女知青第一个被推荐上了大学，走得远远的，因为她在村里也难呆了。她好几次要自杀，吓得大队、公社、县里的层层干部不踏实。她走时，什么东西都没拿，也没有一个人送她，孤零零一个人，只背着个小书包。其实，她也难，也难啊……

“马二河事件”发生后，再也没听说农村干部搞北京女知识青年的，有几句顺口溜流传了好一阵子：“八路军的枪，国民党粮，知识青年的花姑娘”，千万别动，动则毙命。县、地区、省，包括中央都为此事焦虑，北京还专门为这事发过一个严打的文件，结果之一是尽快把滞留村里的北京插队知青安排工作，作为一项硬任务，没有计划的报计划，没有指标的给指标。

我们几个刚刚进色织厂的北京知青有些困惑了，不是因为我们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结果？教育好了才让我们由农民老二哥变成工人老大哥了？难道真的是因为马二河的爱情壮举成全了弟兄们？用北京土话说，丫挺的！

三

我分配在色织厂的织布车间，一开始还以为掉进女儿国了，闻尽人间春色，进了车间才知道几乎都是孟良、焦赞。原来色织行业和棉纺行业不同，人家那儿是《红楼梦》里的大观园，我们色

织厂是威虎山……我拜的师傅姓秦，一开始也没听明白秦师傅叫什么，车间里140多台织布机发生的声音太大了，感觉山摇地动，仿佛站在《英雄儿女》的前沿阵地上，后来，听明白了，那名字叫得地动山摇，秦叔宝，他爹真敢给他起。耳朵里嗡嗡的，车间里分贝至少超过正常人忍受的10倍，每个人说话都是伏在耳边大声喊。从此，我就象巴顿将军一样，跟谁说话都粗声大气像在三军面前喊口号。秦师傅四十多岁，黄裱脸，高颧骨，眉不浓眼不大，黑须黄牙，中等个，眼睛有些像波斯猫，日光灯下泛着黄光。给我的第一印象不怎么样，以后若干天，我就是一个跟屁虫，他前头干我在后面跟着学。我们织的布叫二六元贡呢，就是做布鞋面的礼服呢。织布的工艺非常简单，纬线完了，经线断了，织布机会自动停车，你把断了的经线接上，把线梭子换上，织布机开起来就行了。秦师傅深沉得像一大学究，他开的这4台“车”都停了，我急得手足无措，冒出一头热汗，他仍然稳稳的，匀匀的，脚下像怕踩死蚂蚁一样不慌不忙迈着不大不小的四方步。秦师傅不愧秦叔宝，火烧眉毛方寸不乱。

秦师傅也有快步走的时候，他烟瘾大，替他看车的师傅走到车位前，他抓起衣柜上的香烟三步并两步直奔厕所。色织厂不让抽烟，厕所例外，所以去厕所方便时特不好意思，因为厕所里都是站着蹲着的，也有搬个木凳坐着的师傅，个个有滋有味地抽着烟说笑。我初次进厕所，一头撞进去差一点又弹回来，以为走错了门进了休息室。工人阶级到底不一样，师傅们说的笑的都是拿工厂或者车间的某头头开涮，绝不像贫下中农那样，说赤裸裸的黄段子，唱一丝不挂的情歌，闹着玩儿一群老娘们儿就能把一个大小伙子当众看了瓜。秦师傅特神，即使说到开心处，咧开大嘴露着板牙喷着唾沫星子正侃着，只要一看见我，立马严肃起来，颇有几分师道尊严的味道。

秦师傅特神的地方曾让我敬佩不已，按车间要求，上班前10分钟进车间，提前做好交接班工作。我们年轻人一般提前15到20分钟。与之对比的资格越老越牛的师傅，进车间的时间越晚，但绝不会迟到，因为你迟到了上一班的师傅就下不了班。秦师傅每次都是踩着点进车间，要公正点，要么提前也顶多提前一分钟。我观察他，不是

一天一个礼拜，几乎天天如此，钟点掐得那么准，也是工夫。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发现，秦师傅他们来了不进车间，在外面找个地方抽烟，看着秒针快要走过了，才摁灭烟进车间。秦师傅摆的叫“派”。听我们家老爷子说过，马连良马老板是在听到催“角儿”上台的小锣越敲越急时，才不慌不忙地蹬上高底的朝天靴，稳稳当当走到台口上，那就叫“派”，看来哪个行当都有自己行里的“派”。

秦师傅工作起来一丝不苟，就像大庆人“三老四严四个一样”所说的领导在与不在一个样，那是真的，要求徒弟严也是真的。有一回快下班了，我织了一大块残布，按工艺要求应该拆了重织，秦师傅铁着脸，一声不吭地拆着布，把织错的纬线全部都拆掉，接班的人都来了，下一班的师傅再三让我们下班，由他们接着处理，秦师傅坚定地摇着头，龇着板牙冲人家笑笑。“压堂”一直“压”了一个多小时。出了车间，秦师傅点了支香烟，狠狠吸着，像饿汉子逮住个肉包子。我心里敲着小鼓等着挨训，但秦师傅竟啥也没说，挥挥手叫我先走了。

秦师傅的脾气也大。有一回，我刚刚单独挡车，工艺上出了个大错，被我们乙班班长贾师傅，弟兄们背后叫他“矮脚虎”，《水浒》里挪用的绰号。人凶巴巴的，眼大有神，一对扫帚眉，大叉嘴，在休息室里跳着脚地训我。训着训着话里话外的就糙了，开始上挂下联了。“矮脚虎”张扑着两手，时时刻刻要扑上来，我掏出手绢，认真仔细地擦着脸，贾师傅暴怒，跳着脚地喊：“擦什么脸？什么意思？”我咬着后槽牙，缓缓地说：“擦脸没啥意思，脸上全是水，一脸的口水，还不容我擦擦？”当时已经准备给贾师傅来一套“打虎上山了”。正值此时，秦师傅撞进门来，秦师傅比“矮脚虎”高半头，肯定有人在后面给他“点炮”了，火得他两眼发光，腮上粗胡子茬一起一伏，看得见额上的青筋暴起。他差点把贾师傅拎起来，两个人拿天津土话爆豆般吵起来，最终以贾师傅气得一跺脚，骂了句“找车间领导去，我不干了”，气鼓鼓地甩门而去告终。秦师傅扭头对我鄙视地看了一眼，认为他收的这个徒弟是“泥人张”捏的。后来才知道，秦师傅也有绰号“坐地虎”，当然，老虎发威是因为两虎相争，“坐地虎”更凶些。

秦师傅“大看”徒弟，亲自给徒弟敬烟叶缘于政治学习。

秦师傅是“铁红”，工人阶级中的无产阶级，用他们天津话说，比天津三条石的老工人还硬，是我们乙班的工会组长，相当于贫下中农的贫协主任。秦师傅惧怕政治学习，但他又是我们乙班政治学习的头，必须参加。所谓政治学习就是下班后再坐在会议室里念报纸，上完早班，早晨6点上，下午2点下，下班后学习还行；上完中班，下午2点上，晚上10点下也凑乎；唯独上完夜班，晚上10点上早晨6点下，那就是贫下中农开会，是活受罪。自从有了色织厂，有了这个三班倒，厂里就流传着一句名言叫：“早班得玩，中班得睡，夜班受罪。”纺织行业挡车工上夜班，八个小时是硬硬地瞪大眼睛熬着，稍一迷糊，就织错布出残疵，就得拆了重织，来不得半点虚假。下了夜班，用天津话说，跟过大堂似的。秦师傅是政治学习的召集者，但是个“开明领导”，尤其是刚下夜班，大家都坐在那儿“点头哈腰”进入半睡眠状态，秦师傅半合着眼，过一会儿，睁眼问念报纸的人念完了没有？再过一会儿又问念完了没了？念报纸的都是我们这些当徒弟的北京知青，谁也不傻，跳着行念，隔着段念，一会儿说念完了。秦师傅把烧到手指头的香烟一摁说，学得很认真，回去好好联系实际，散会！弟兄们像枪响惊起的老家雀儿，呼啦就散了。有时候刚坐下要开会，秦师傅说他的东西忘车间了，让我们自学，他回车间一趟。他一走，有的师傅也不说话拿着包就“开路”，大家一窝蜂散了，我感觉是秦师傅故意“放鹰”。

有一天下了早班，正学习讨论呢，其实就是拿着报纸扯闲天，北京人叫侃大山，天津话叫聊天大天。厂里的政治部宋主任一推门进来了，那年月全国学解放军，我们明明是工厂却偏偏要成立什么政治部。宋主任“左”得幼稚，不愧为政治部主任。他一来，没一个人说话了，宋主任左开导右启发，根本没人搭理他。那时候正开展“要认真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习活动，因为秦师傅是工会组长，负责政治学习，和宋主任正对口，宋主任看工人们都不说话，就直接问秦师傅，学习《反杜林论》有什么收获？要说我们班没学习那是冤假错案，贾师傅还问过这位姓杜的师傅因为嘛

事得罪了马克思？那个姓费的叫嘛哈哈的，就是费尔巴哈，到底是反对嘛人？到底是革命的呢还是反革命的？那费费嘛哈哈不是美国特务吧？贾师傅是我们乙班的班长，他都搞不明白，焉问其他人？宋主任一问，秦师傅真毛了，他连杜林的名字都没记住，秦师傅、贾师傅和我们乙班的全体师傅好像都很惧怕宋主任，都闷头抽烟，问急了就假装咳嗽，剧烈咳嗽，不停地咳嗽。

宋主任算是死死瞄上秦师傅了，看着秦师傅清嗓，师傅们都为秦师傅捏把汗，被宋主任这位“左庄”的老大抓个典型那滋味比上夜班要难受几百倍。

我敢肯定，秦师傅连看也没看过《反杜林论》，全班的师傅也没有一个看过这本书的。厂政治部是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布置学习的，开过动员大会，我还记得宋主任在主席台上讲，咱们工人是领导阶级，学习也得领先一步，干活是三班倒，学习是不倒班，班前要学，班后必学，不干活了就学。不能看着自己的师傅做瘪子。说实在的，在认识北京知识青年的知识作用方面，别看老大哥是领导阶级，但确实不如贫下中农眼中有水，贫下中农懂得知识的力量，拿弟兄们大小当个“神仙”敬着。自从一进工厂，全就成学徒工，小徒弟，不管你下巴底下的胡子多长多密，脸上的皱纹多深多密，师傅们一说起来那是谁谁谁的小徒弟。我赶忙递过一句话去，说秦师傅天天班前班后领着我们学，师傅们学得都比我们好。我对宋主任说，我是秦师傅的小徒弟——这是潜规则也是硬规矩，不情愿也得加上“小”。天津工人阶级队伍中不成文的规矩，没出徒前，你就是“老黄忠”“姜子牙”也是小徒弟，而且前面必须加小——我先讲讲我的学习体会，然后请秦师傅批评指正。没想到竟如冷水入沸油，一屋子师傅都瞪着眼珠子看着我。我心里有谱，《反杜林论》我真好好读过，“文化大革命”中提倡斗争哲学，我们不但热衷于革命，还爱上了哲学。毛主席又号召我们“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反杜林论》是恩格斯的精典著作，又是精典的哲学著作，那时候闲得无聊，看书特别难，为了找一本《海底两万里》我曾骑着车子从朝阳区冒着凛冽的寒风骑到海淀区。但要找一本白皮红字的《反杜林论》单行本，书店就有卖的，全套的注释，封

面上还印着像雄狮一样的恩格斯头像。那时候年轻，脑子好，读两遍就记住了，讲起来也是后句赶前句的，先把杜林老爷子介绍一遍，又扯到费尔巴哈、黑格尔、康德，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慢慢地我看出来了，不光师傅们没看过这本书，宋主任也没怎么看过，我更放心了，拿出北京知青侃大山的看家本领，只说到恩格斯批判杜林的唯心论的先验论，阐述无产阶级的唯物论的反映论。宋主任小心翼翼地问我，毛主席不是批判林彪天才论说不是唯物论的反映论，而是唯心论的先验论吗？我回答，恩格斯在前，恩格斯写这篇文章时，毛主席尚未出生，15年后，中国才出了个毛泽东，毛主席最早是1932年在江西瑞金时始读此篇。目中余光所见整整干了一个班的师傅们听得大眼瞪小眼，再瞄瞄宋主任，似乎也呈“洋鬼子看戏”状，傻眼了。我知道火候已到，京剧讲究一声高腔戛然而止。俄而，宋主任才连连说，乙班学得好，学得不错，学得深刻，启驾而归。秦师傅欣欣然，师傅们乐陶陶，贾师傅很“隆重”地从口袋里掏出一包“金恒大”香烟，平时贾师傅都抽烟丝卷炮，“金恒大”自己是万万舍不得抽的，那是敬领导的“马屁烟”，万万想不到的是，此时他竟然抽出一支来“敬”我。受宠若惊啊！连秦师傅出手讨无支“金恒大”都被贾师傅用手挡回去，我想那就大大方方气派地吸口胜利烟吧！满座的人看着我深深吸一口烟，又长长吐出来，高兴地鼓起掌来。按着“天津三条石”老工人师傅的潜规则，我的称谓也发生了变化，过去是说我是秦师傅的徒弟，现在都改口叫秦师傅是他的师傅，意思是一个意思，侧重点不同了，前者是徒弟靠师傅截着，后者是师傅靠徒弟增光。

1976年丙辰清明过后，我从北京回色织厂，火车晚点5个多小时，那年的春天特别冷，虽说刚过清明，可“返了春，冻断筋”。千忍万熬地到了站，差点冻成“半身不遂”。一下火车竟然看见秦师傅冻得瑟瑟发抖地站在月台上。我们厂在的是个只有慢车才停的小站，候车室有窗无玻璃，有个大炉子不生火都冻青了，说话都费劲。我以为他接什么人呢，他说等了我大半天了，是接我的。我真奇怪了，我那点破行李没多重，全是些吃的喝的，何止于师傅挨冻半天接我？秦师傅握着我的手，神秘得像解放前的地下工作者，环顾四

周，又看看前后才压低了嗓门说：“回到厂里什么都别说，千万千万不能说去过天安门，没见过什么词，更没抄过什么诗，宋主任在政治部等你哪，命令单身宿舍的门卫一见你，不许先回宿舍，马上领到他办公室，审查！咱县里别的工厂已经抓了五六个了，都是你们北京知青小徒弟！记住了？躺老虎凳，站罐笼也没去过天安门，老宋那家伙嘛人？是笑面虎！别听他哄人，‘说了吧，说了一点事没有’……”

秦师傅有些碎嘴子，平时就爱说车轱辘话，但那天不是，他嘴冷得像拉不开栓的枪，但他怕我听不清楚，听不明白，一遍又一遍地叮嘱，我这辈子都忘不了那一句句滚烫滚烫的救命话……

四

色织厂的天津师傅们分两类，一类是带家属来的住家属院，一类是单身来的住单人宿舍，和我住一个宿舍的还有田师傅、孙师傅，空一张床，一间十七八平米的大平房，挺宽绰。

田师傅至少上推三辈子都是工人阶级，血统挺纯，纯粹的无产阶级，别的师傅说田师傅是色织厂最会过日子最刻薄自己最抠的人了。形容田师傅有一句专用语：蚂蚁放屁——小气。田师傅特别喜欢喝茶，后来因为舍不得买茶叶，改喝白开水。据师傅们说，有一回住后排的张师傅从天津带回点茶叶让田师傅品品，给田师傅茶缸里捏了一点，没想到一个礼拜后，张师傅偶尔看见，田师傅还在喝那点茶根，冲出来的茶比白水还白，田师傅还意味深长地说，有味道啊，真提神，好茶啊！纯天津土话。田师傅自豪起来喜欢挺胸昂头，把大瓷缸子的盖重重地扣在桌上，用蹩脚生硬的北京话背诵毛主席语录。我几次都憋着笑，不禁联想到鬼子进村说的中国话。但“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还没慷慨起来下面就没词了，那神态就像电影里演的“老子抗战八年……”

田师傅穷了好几辈子，三辈子人中一共吃过几个“狗不理”包子都记得清清楚楚。田师傅说他爷爷的爹做梦都梦见有台自己的机器，在梦里如果当了一个小小的资本家，能高兴得半夜笑醒了，醒了又狠狠抽自己两大嘴巴，谁让你笑？你不笑还在甜蜜的梦里头。田师傅最大的梦想最现实

的梦想是有钱，腰里揣着 100 元钱，一摇三晃摆出有钱人的谱去起士林吃西餐。田师傅在天津生活了 44 年，仅仅在起士林店外走过不超过 3 回，西餐是什么？他根本不知道。有一回说漏了，他认为是用刀子切着蘸着高级酱油的牛皮冻，就着刚出笼的“狗不理”包子。但他知道只有有钱人，特有钱人，外国人才能吃得起西餐。我说我就吃过西餐，北京老莫，莫斯科餐厅。田师傅当时喝着白开水差点呛着，从他的眼神中看出他根本不相信，一个当小徒弟的又不是洋鬼子吃过什么西餐，梦里吃的吧？后来，自打《反杜林论》以后，我名气大增，有一天下中班，半夜回到宿舍，田师傅走到我床前挺认真挺严肃，都有些敬穆地对我说，你真吃过西餐！我抬头看着田师傅，田师傅激动得腮上的肌肉都在颤动，说，你是咱厂唯一一个吃过西餐的人……

田师傅特神，不上班时总爱一个人坐在床沿上发愣发呆，很像佛教徒做功课，打坐，有时念叨着什么，一遍又一遍，反反复复的。不像孙师傅，大大咧咧，说说笑笑。我看他举止有些怪异，就悄悄地问孙师傅，孙师傅哈哈笑了，一点都不避着田师傅，说田师傅在想老婆哩，在空气中和老婆孩子对话哩，弄得我反倒挺尴尬。

田师傅生活确实节俭，在食堂吃饭，从来都是 5 分钱一份的熬白菜，我以为他是素食主义者，后来厂里聚餐才知错了，我看田师傅吃了尖尖一碗红烧肉，把碗里的肉汁肉汤都冲上开水喝了。田师傅工资并不低，上个世纪 60 年代末一个月就开 70 多块钱，但他家庭负担重，除一妻二女外，还有一位年迈的老母亲，田师傅有时闲下出去遛弯，看见有木条树枝就捡回来放在宿舍的窗户下。我问他捡那些东西干什么？他说，天津买劈柴要本，每天点煤球炉子费劈柴，回天津探亲时带回去多少顶点事。看得出老师傅们都有些看不起田师傅，我却格外尊敬他。

有一回我们几个“小徒弟”正打扑克，那时候输了就往脸上贴纸条，觉得有人站在我身后，回头一看竟然是田师傅。我一把把贴在脸上的纸条扯下来，赶忙站起来说，田师傅，您别站着，您玩！田师傅笑着说，我不会。不会您站在后头看？田师傅俯在我耳边悄悄地说，等你玩完了我想问你一个字。我赶忙说，那你问吧！田师傅说，那不就耽

误你们玩了吗？我奇怪地说，一秒钟的事，你说，连摸牌都耽误不了。田师傅却非要拉我出去，避开人，像递送密电码似的，左右看看确实没有人了，才问了我一个极普通的字。田师傅这人家庭观念极重，他下班后最重要最神圣的工作就是写家信，毫不夸张地说，一封信能写半个月，戴着老花镜像金石学家在雕章刻印。

有一次我正看书，田师傅又端着那个印着色织厂级劳模的白瓷缸子踱到我跟前，问我看什么书？我说随便翻翻，一本唐诗。他又夸了几句我有学问，就问我看什么唐诗呢？我说正翻到李益的一首七绝，就随口念起来：“回乐烽前沙似雪，受降城外月如霜。不知何处吹芦管，一夜征人尽望乡。”他问我什么意思？我便一句一句解释起来，讲完一抬头，看见田师傅竟然两眼泪闪闪地，口中念叨着，多好啊，一夜征人尽望乡……

天津师傅们也有乐的时候，也有“吃嘛嘛香”的时候。他们几乎无人不乐于钓鱼捕鱼，千里迢迢从天津迁到山西晋西北一个小县城还都带着捕鱼的家伙。

到大倒班的时候，也就是星期五下午 2 点下早班，星期天夜里 10 点上夜班，类似咱们现在的双休日，师傅们特别是单身师傅们都要三五相约了去逮鱼。我曾经和几位师傅去过一次，以后再叫我去我都想办法推辞了，不是受不得那苦，忍不下那罪，是没那么大的瘾。一提鱼虾，哪怕是臭鱼烂虾天津人都两眼冒光，千万不能说腥，天津人的字典中绝无此字，那叫鲜，越腥才越鲜。

骑自行车，大约相当于从北京前门楼子一直骑到天津卫杨村，才到那片当地人称海子，就是一片水洼子的湿地。一下车师傅们连句话都顾不上说，解包的，拿网的，架车的，穿水裤的，真有点上战场的意思。

住在我们后排宿舍的张师傅，40 多岁了，兴奋得就像一个小伙子，非拉着我下水，站在没膝的水中撒网，让我帮他打扫战场，收缴战利品。还给我讲，这网该怎么拿怎么团，怎么才能使上劲怎么才能扬得高，真正撒网的高手是一手网，一只手撒网，撒出的网还要像荷叶一样。张师傅撒出去足有十几网，网住的都是小鱼小虾，没有一个“骨干分子”。但高兴得像中了彩得了奖似的，有声有色有滋有味地对我说，千万别小看这“小

“柳叶”——很形象很逼真，那鱼苗条得挂在树上就是柳叶。这“小柳叶”蘸点面糊，面糊不能太稠，也不能太稀，往面糊盆里一滚，赶快拿出来往热油锅里一放，千万不能炸功夫大了，滋溜一下就行，再薄薄地撒上一层椒盐，五香粉，辣椒末，喝一口老白干，知道嘛叫神仙吗？我心话，那神仙也好当。但师傅们玩得真开心，真舒畅，真幸福，都抽着“海河”香烟，2毛2一包，当年就算上档次的了；哼着小曲，一收网，看见的不是活蹦乱跳的小鱼崽子，是一盘盘金黄黄的油炸“小柳叶”……

最难忘的是和杨师傅去打猎，猛地一眼看着杨师傅那杆锃明瓦亮的猎枪，把我吓一大跳，那可是真家伙，杨师傅诡秘地笑着说：小心点，顶着火哩！

打猎新鲜，对此我比去打鱼的自觉性和主动性、积极性高百倍，但还得凑杨师傅的功夫和兴趣。

一天杨师傅把我叫到他宿舍中，很严肃地问我愿意不愿意和他一起去打猎？太愿意了！他又很严肃地说我得先帮他办件事，然后就去打猎。我不知道什么事，也严肃起来。杨师傅说求我帮他给他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大儿子写封信。我特严肃地对杨师傅说，以后您千万别严肃，我以为绑票劫道呢，不就是写封信吗？给你打个比方，绝对比打死一只蚊子要简单和容易得多。

打猎果然不一样，夏天也穿着长衣长裤，系着绑腿，带着绳子、背包、干粮、水壶，杨师傅让我腰里佩一把带鞘的匕首，我感到好像去打日本鬼子。

打猎真辛苦，沿着青纱帐趟着野地，像日本鬼子“五大扫荡”似的撵兔子。饿了吃口干粮，渴了喝口水，抹把汗，继续。也别说在西山根下的谷子地里真轰出几只野兔子来，杨师傅枪法真够可以的，一枪真撂倒一只，用天津话说真行！黄褐色的兔毛还一起一伏的，兔子不大，杀出来也就一斤肉吧，直到我捡起它来，它才无奈地死去。

不管如何，终有斩获，劈手斩得小楼兰。我也放了两枪，过了枪瘾。但杨师傅并不着急打马回营，反而在野地里坐下，有板有眼地哼着《天津时调》，抽起烟来。

好戏还在后头。

杨师傅拿出4个窝头让我到村里引出条“野

狗”来，只要把“野狗”引出村，引到野地里，就大功告成。这一带我特熟悉，别说狗，人都吃不上纯玉米面的窝窝头，一般人家的狗都是在猪食槽边吃两口，能吃上一顿山药蛋拌泔水就不错了。这4个金黄金黄的窝窝头对于时时处于半饥半饱的“野狗”无疑是难以抵御的“糖衣炮弹”。没费什么气力，我就引逗着两只“野狗”钻进了青纱帐。杨师傅生就一双豆英眼，细长细长眯成一条窄窄的细缝，平时学习时就像闭着眼睛睡着了似的，但这时却突然睁大了，且贼亮贼亮地发光。

杨师傅的枪法，在10米左右远的地方打死一只狗是手拿把攥。随后他像只出窝的山豹子，拿着条口袋嗖地窜出去，一眨眼又背着“战利品”跑回来，喘着粗气压低嗓子催促我，快走，快走，像鬼子进村似的。

离开十几里路以后，杨师傅找了个偏僻的地方，把死狗挂在树上，剥皮开膛大卸八块，双手鲜血淋漓，但是掩饰不住他的得意劲。让我把点着的香烟插到他嘴上，含糊不清地哼着小调，我以为又是什么《天津坠子》、《唐山大鼓》，侧耳听还真不是，竟然是《游击队员之歌》：“没有吃没有穿，自有那敌人送上前，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

哪儿挨哪儿啊，杨师傅真逗。

杨师傅不吃独食，回去就扯开他那带着唐山口音的天津腔招呼他要好的师傅们吃兔子肉。杨师傅真能吹，说那兔子贼精贼精的，跑窜得快似一溜风，那功夫万万不能眨眼，一眨眼什么都没了，他连瞄都没瞄，抬手一枪，一枪毙命。那肉味从锅里飘出来还真香，师傅们也差不多都“三月不识肉味”了，每一个人都在深呼吸，每一个人的喉节都在上下蠕动。我撒脚如飞，跑到家属宿舍找到秦师傅，秦师傅非常高兴，出了门又蹦回去翻箱倒柜，翻出一瓶地道的天津“直沽高粱”，三步并两步地去了。

那天晚上，开宴已然半夜了，但都高兴得比过大年还乐，师傅们也不白吃杨师傅的，拿烟拿酒拿果仁，拿泡菜拿十八街麻花的。我请了两回田师傅，他都不去，我后来明白了，他不想白吃。而我拿了一瓶正宗北京65度的二锅头。那天师傅们都喝得有些高了，为什么说他们喝高了呢？七八条沙哑的烟酒噪一齐高唱：“竹板这么一打

呀,是别的咱不夸,我夸一夸,这个传统美食狗不理包子……”

五

我们车间“挂布”的,就是量布的刘师傅是个“怪人”,他一点都不像其他天津师傅,不说不笑,甚至看不见他抽烟喝水坐着歇会儿。外表也奇特,一头银光闪闪的白发自然后背,戴着一副老式的金丝眼镜。秦师傅没有多给我介绍过,只是不经意地说,老刘?文革前我们戏称刘主席,现在改大号为“刘少奇”了。经秦师傅一点拨,再看,刘师傅背头银发,大鼻子,两颗突出的门牙,还真有点像。我来车间两年多,都出徒转正了,从没看见刘师傅对任何人说过一句话,甚至在食堂打饭,也是使用躯体语言。这人真怪,学习开会都爱挑一个阴暗的角落坐在那里,别人侃大山发牢骚骂领导,他却充耳不闻,熟视无睹。两伞间只和我说过一句话,那是两年前,我喊他刘师傅,他压低嗓音对我说,别叫师傅,叫我老刘。后来我知道了,刘师傅是这个厂的资本家,后来叫资方代理人,再后来叫资方厂长,再后来就被打成右派,再后来老人一个人孤零零地随色织厂迁到晋西北。他住在我们前一排,常看见他工余之时无语对斜阳。我心中有些愤愤不平,我在农村插队时,村里的地主富农该笑时也咧咧嘴,工人阶级那根阶级斗争的弦比贫下中农绷得还紧,透过刘师傅从未有过任何表情的脸,你能体谅出这位全车间年龄最大,已近六十的师傅心中的苦啊!

我们班的十几个北京知青好像约好了似的,都特别尊重刘师傅,人前人后都是毕恭毕敬地喊刘师傅。

有一回开完班会后,大家都争着挤着往外窜,每回刘师傅都默默地让别人先走,我心里就气不过,我们几个北京知青拔拉着那俩复员大兵,毫不客气地说,能不能讲点公德?你没看见把刘师傅都挤到墙根里去了?我们个个都凶巴巴的,那一次不论刘师傅怎么谦让,怎么推辞,我们到底让他先走了。师傅们也没说什么,只有班长贾师傅爱抚地拍着我的肩头说,行啊……

刘师傅的发家史能写一本书。师傅们说,当初他也是个织布工,和业主的闺女好上了,就

接了手,当时不过4台老式织机。刘师傅肯干,关键是能干,在他手上一台一台机器地增加,到天津解放时,他已是拥有45台织布机的不大不小的资本家了。老师傅都知道,刘师傅那时候特进步,那才是党叫干啥就干啥。还没解放,国民党政府派人动员他把厂子搬到上海、广州去,但地下党代表找到他做工作,刘师傅就拒绝了国民党的动员,坚定不移地迎解放。刚解放,厂子办不下去了,工人没吃没喝。刘师傅的色织厂第一个复工,他说他听共产党的,听新中国的,赔钱也得干,也得给工人阶级关饷!

抗美援朝的时候,他又积极响应共产党的号召,把老婆的金银首饰,老太太的棺材板钱都捐出来为朝鲜前线买飞机,买大炮,他甚至跑到银行要卖工厂,学习常香玉,捐飞机打美帝!公私一合营,刘师傅又是全天津市第一批合营企业,用刘师傅的话说,听共产党的没错!他三番五次地找区领导,找军代表,要捐出他的工厂,献给共产党。

后来,刘师傅虽说是资方厂长,比共产党任命的书记兼厂长还认真负责,吃住都在厂里,和工人一样顶班。他几次找各级领导虔诚地表示,自愿放弃股份,只领工资不要利息。各级领导都好言相劝,拿党的政策开导他,他才同意,因为他坚信听共产党的话,没亏吃。1957年“反右”时,他正在外地和湖北一家企业搞技术联营,忙得几个月没回家。厂里一连几封电报催他,那时候党中央号召要帮助党整风,一次次动员,一次次鼓励,在工商界开的整风会上,刘师傅终于又一次响应党的号召,站起来帮助党整风,提了几条意见,其结果是资本家右派,团泊洼劳改农场劳改三年,摘帽以后回车间劳动。这时刘师傅头发彻底白了,腰也弯了,再也不说一句话了。

刘师傅的苦,刘师傅的罪,刘师傅的难还不止于此。

“文革”一开始,刘师傅虽然是“死老虎”,但被当作“活老虎”打,每次批斗都被红卫兵打得头破血流,胸前身后挂着个白布条,上面写着“反动资产家右派分子”,批斗完了,刘师傅还得洗干净脸,包包伤,进车间继续干活。

刘师傅心里苦是苦他的3个孩子,为了与他划清界线,为了能够躲开他的反动影响,老大远

远地去了云南建设兵团，老二跑到了东北建设兵团，老三是个女孩去了内蒙巴盟插队，走时才16岁。刘师傅朝思暮想，挂念不已的就是这个小姑娘。每天上下班，刘师傅都极认真地跑到厂传达室放信件的网框里一封一封地翻看，有没有他的信。没有他的信，他也不叹息，不埋怨，默默地离开传达室。

有一天班后没事，我们几个北京知青和天津老师傅打赌，我们能叫刘师傅说话，说心里话。师傅们说那才是铁树开花呢！有一个和我们一块分到色织厂的北京知青绰号叫“王疙瘩”，因为他一脸的壮疙瘩，但人极聪明。他拍了胸脯，一赌三，赌资是一瓶纯正的65度北京二锅头，外加一瓶猪肉罐头。

那天下班后，我们三个人一起来到刘师傅宿舍，宿舍的人都出去了，刘师傅既没欢迎也没反对我们，他不以为我们是找他的。我们拉过板凳半围着他坐下，你一言我一语聊开了，只当刘师傅不在，说得热火朝天，云山雾罩。刘师傅默默听着不插嘴说一个字，连咧嘴笑笑的表示都没有。

说到哥几位都喝了一大茶缸子的水以后，王疙瘩自然而然地提起他妹妹在内蒙巴盟插队。王疙瘩的妹妹和刘师傅的女儿插队在一个旗。

王疙瘩十分动情地说，刘师傅，我下月去内蒙古看我妹妹，一定去看看你女儿，放心吧！这下，刘师傅激动地站起来，紧紧地拉着我们的手，握了又握，摇了又摇，却一句话都不说。王疙瘩说，刘师傅有什么心里话你就说吧，我们都是插过队的人，什么风雨没经过？刘师傅深情地望着我们，那么真挚热情，那么压抑混浊，慢慢地两颗泪珠从眼眶中滚出来。终于刘师傅说：孩子不认我啦，我是反动资本家，右派分子，从来没有给我写过一封信……

1978年10月，我考上大学要走了，就在色织厂食堂摆了几桌谢师酒。该请的师傅都请到了，就是刘师傅怎么说都不来。没办法，只好请王疙瘩大驾出马。王疙瘩对刘师傅有恩，那次去巴盟看他妹妹，不但把刘师傅闺女的照片给带回来，还给刘师傅带回一封像书一样厚的家信。

那天刘师傅最终还是来了，但已是酒席将散时，他说什么也不肯坐下，我双手敬他一杯酒，闹哄哄的酒席上顿时鸦雀无声。刘师傅把酒杯凝重地接住，然后高高地端起来，他蠕动着嘴唇，激动得白发衬托的瘦脸都红涨起来。我知道，他想送几句勉励我的话，但最终一句话也没说出来，把酒一干踉踉跄跄地走了……

责任编辑：钟小骏